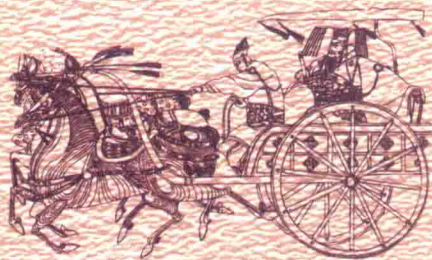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白云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白云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白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11-07816-5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历史
编纂学—中国 IV. ①K092②K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863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LISHI BIANZUAN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白 云

责任编辑: 史霄鸿 魏清荣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16-5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达，是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及与之相关的史例、史法等问题，思考史家的主体修养对史书编修的影响，正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思想上的深邃性。

民族史学具有重史的传统，包括重视历史编纂的传统。这里面有几个问题，要进一步做出分析。

第一，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大理论价值。

首先，论史书编纂，要整体来认识，孤立讨论历史编纂学问题，探讨其中的精义，很困难。史学的内容与形式，辩证地联结在一起。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反映内容，并对内容的体现起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史”，包括史事、史文与史义，也决定了思考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要把三者结合起来。其次，经与史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正所谓“六经皆史”。由于经有一定形式，也影响到史书的编纂形式。总之，思考历史编纂学，必须要把握这两点。

《史通》的开篇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推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

刘知幾的这一看法，可以说，从深层次的意蕴上，彰显出史书编纂与客体历史的关联。历史有内容，历史的“事”，无非是“行”与“言”两个方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产生不同的史书文献。当然，这只是形式的差异，“言”与“事”二者分不开，《尚书》何尝不载事，《春秋》也不是无言之书。

历史变化是一定时空下的史事的变化。没有“时”，不会有“变易”（易之三义，基本点在此），也就不会有历史。因此，突出“时”的主轴，是历史编纂的基本要求。《左传》编年系事，编年体也就成为史书最早成熟的编纂形态。结合具体的时空，总结出内中含有的普遍意义的认识，成为历史经验总结的要求。

以“地”为特征的是《国语》，后世的“方志”以及纪传体中的地理志书等，可以归入此类。

而以人为中心的天、地、人相互联系的整体史观（即司马迁说的作史要“究天人之际”），是纪传体史学的核心理念。这样的一幅天人之际的图景，是变动的时空观与天人联系的整体观的结合。司马迁说《史记》体例的设立，是：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月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2]

[1] 《史通》卷一《六家》。

[2]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创造出《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裁，是一大贡献，司马迁因此也被称之为中国“史学之父”。应该说，从史书编纂的确立开始，就内含着对历史的理解，这在世界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正史，纪传体书成为正史的编纂形态，不仅是形式上，而且在于其二重性。^[1]这一改造，归功于《汉书》。班固的《汉书》满足了封建王朝二重性要求，无怪乎《史记》产生以后，很长时间不被重视，甚至被说成是“谤书”。

封建王朝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一定要重视吸收历史上，特别是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这只能从真实历史记载中，才能寻找到。另一方面，帝王要为自己朝代的兴起寻找根据，为在精神上控制社会，在当时认识水平条件下，只能乞求于天命的理论。所谓“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2]因此通过历史的作品宣传皇权神授，这又是曲解历史。真实的历史记载与曲解历史的说教，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二重性在史书、史评、史论中，都可体察得到。史书编纂的书法义例，既主张实录、直笔，又主张为君王讳。刘知幾的直笔论就包含二者，看似矛盾，实是其史评的特点决定的。

史家对客体的解读与史事评价，这种解喻，有没有历史真实，是当代史学理论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所谓“真”有具象之真，有实有之真，有本质之真。这些问题的讨论，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进一步讨论，只能另作专门辨析。

第二个问题，更革、创新是传统史学的一种自觉意识，所以，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不断向前发展。

刘知幾考察了史书编纂的发展，认为从体裁上说，《史记》以后的状况堪忧：“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3]这种相与因循的积习，导致史学的衰微。就编年体来说，“降

[1] 参见拙作《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第十四章第二节《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

[2]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3] 《史通》卷二《二体》。

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1]。由此，他提出史学一定要更革，说：“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2]

章学诚指出纪传体史书经过长期发展，到了后来，成了没有创造活力的“程式”，如同八股文一样，他有一段评说，发人深思，他说：

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3]

章学诚的话，表明了史书编纂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要把独断之学精神贯穿其中。有此精神，有一家之言，方可避免历史编纂流于形式化。他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

[1] 《史通》卷四《序例》。

[2] 《史通》卷二《载言》。

[3] 《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下》。

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1〕}

第三，史学综合性体裁的提出。

历史编纂学发展史表明，史书虽有不同的体裁，但每一种体裁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体裁的运用。通过多种体裁运用，以表明作史者之心迹。

例如，司马迁在吸收各种史书优点基础上，创立的纪传体，实际是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形式。本纪突出了编年体的优点。列传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反映出对历史的一种见解。书是典志体的前身，全面反映了典章制度的内容。表能表列盛衰，清晰地展示一代兴衰变动的大势。刘知幾说这种体裁：“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2〕}纪传体的五体，能全面地反映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变化。

又如，纲目体突出了史论的特色，使史学纳入理学的体系中去，“会归理之纯粹”。其特点是“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矣”。

因为社会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多面的，史学无论采用哪种体裁，都有综合性的要求。

在这方面，清人马骥的《绎史》具有创造性。白寿彝先生说：《绎史》160卷，“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有人物传记，有诸子言论，有书志，有名物训诂，有古今人表，有史论。就体裁上讲，它是更为发展的综合体”。

中国史学近代化产生的章节体，是历史观念的变化，但章节体同样是综合体裁，可以写历史事件，也可以用于编人物的年谱、传记。以章节体写出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世界史，其间的高下，往往不是体现在章节的形式上。

〔1〕《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答客问上》。

〔2〕《史通》卷二《二体》。

今天，我们更要注意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吸收史书编纂的经验，发扬民族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白寿彝先生谈到今天史书的体裁问题，说：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为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马骥的书，在体裁上虽然采用了很丰富的形式，反映了他的才能，但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不精，我们还是可以对它提出更高要求的。^{〔1〕}

新世纪的史书编纂，还要有世界的眼光，要善于总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编纂学的优点，以进一步推动当今的史学工作。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经济、文化，成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历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历史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关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重视体育、金融、疾病、灾害对人类发展带来的震动等。当代史学的发展，对史书的编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注意运用新的综合体裁，不断创新。

白云教授撰写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卷》，注重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他对每一重大历史编纂学的思想，有专门的讨论。作者长期关注这一课题，本卷中所见，得益于其多年研究。相信中国历史编纂学思想的研究，今后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目 录

题 记 / 1

绪 论 / 1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 / 1

第二节 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 / 4

一、史学思想 / 4

二、历史编纂学思想 / 6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历史编纂学的变革 / 8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的产生和发展 / 9

第二节 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变革 / 19

第二章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 35

第一节 客观与主观 / 35

第二节 天命与人事 / 39

第三节 直书与曲笔 / 46

第四节 实录与名教 / 50

第五节 审慎看待史学二重性 / 53

第三章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 / 57

第一节 史书的编与著 / 57

一、述、作、论 / 57

二、著、编著、编 / 62

第二节 史书的体裁与体例 / 64

一、体裁 / 65

二、体例 / 67

三、名与实 / 70

第三节 史法与史意 / 74

一、史法 / 74

二、史意 / 78

第四节 通代与断代 / 82

第五节 历史表述 / 86

第六节 德、才、学、识 / 88

第四章 《春秋》与传统编年体的史学观念 / 92

第一节 《春秋》的史法和史义 / 92

一、通与殷鉴后世 / 93

二、仁与内圣外王 / 96

三、礼与属辞比事 / 97

四、信与书法不隐 / 100

五、忠与亲亲尊尊 / 102

第二节 叙事与论史相结合 / 105

一、言事相兼，史论相融 / 105

二、“惩恶而劝善” / 108

三、“尽而不污” / 111

四、“婉而成章” / 112

第三节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 / 113

一、“通比其事，例系年月” / 114

二、“嗣赏罚，辅法教” / 115

三、“立典有五志焉” / 117

四、“区分类例，见微察著” / 119

五、“抑百家，崇圣典” / 121

第四节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 123

一、“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 / 123

二、“通各代成一史” / 126

三、“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 128

四、“借其年以纪事尔” / 132

五、“叙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 134

第五节 实录体及其编纂观念 / 137

一、皇权中心意识 / 138

二、鉴戒的观念 / 141

三、求实的观念 / 145

四、求新的观念 / 147

第六节 纲目体与朱熹的编纂学思想 / 149

一、纲目体的创立和发展 / 149

二、朱熹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151

第五章 从前四史看纪传体编纂观念的变化 / 159

第一节 《史记》：司马迁的通变思想与“成家立言” / 160

一、“通古今之变” / 160

二、“成一家之言” / 170

三、“志古自镜，述往思来” / 175

第二节 《汉书》：班固的皇朝意识与断代为书 / 177

一、皇朝意识与宣汉思想 / 177

二、断汉为书与“上下洽通” / 181

第三节 《三国志》：陈寿的全局意识与人物品第 / 184

一、总揽三国的全局意识 / 185

二、重视人物品第 / 190

第四节 《后汉书》：范晔的类例思想与整体史观 / 195

一、以类相从的类例思想 / 196

二、“正一代得失”的整体史观 / 200

第五节 隋唐以后的纪传体编纂观念 / 203

一、“修史取鉴”与“治心治世” / 204

- 二、辨明正统 / 209
- 三、“国灭史不灭” / 214

第六章 典制体编纂观念的进步 / 218

第一节 “统括史志，会通古今” / 218

- 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 218
- 二、“统括史志，会通古今” / 220
- 三、“以类相从，举其始终” / 223

第二节 郑樵的会通与“自得” / 225

- 一、“会通之义大矣哉” / 226
- 二、“详文该事，无待美刺” / 228
- 三、“一家之言，自得之书” / 231

第三节 “变通张弛之故” / 233

- 一、“会通因仍之道” / 233
- 二、“变通张弛之故” / 237
- 三、“叙事为文，论事为献，窃注己意” / 240

第七章 纪事本末体编纂观念的变化 / 242

第一节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和发展 / 242

第二节 “区别其事而贯通之” / 244

第三节 “论次宋事而比之” / 249

- 一、“类总其萃，年系其时” / 249
- 二、“论次宋事而比之” / 250

第四节 “广稽博采，勒成一编” / 252

- 一、“广稽博采，勒成一编” / 252
- 二、“各附论断，曲折详尽” / 255

第五节 “因事命篇”与“尽事之本末” / 257

第八章 学案体与黄宗羲的编纂学思想 / 262

第一节 学案体的创立和发展 / 262

- 一、学案体的学术渊源 / 262

二、学案体的创立与发展 / 264

三、学案体向章节体学术史之发展 / 266

第二节 黄宗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268

一、“学有宗旨” / 269

二、“一本而万殊” / 270

三、“分源别派，宗旨历然” / 272

第九章 史注、史评、史考中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275

第一节 经世致用与鉴往训今 / 276

一、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 / 276

二、鉴往训今的史学功用 / 288

第二节 直笔求真 / 294

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 294

二、“记事悉从其实，是非万世不掩” / 299

第三节 博采善择与辞达为上 / 308

一、博采善择的取材标准 / 308

二、辞达为上的表述要求 / 313

第四节 史家的修养 / 319

一、史才三长 / 319

二、公心·直笔·明识 / 320

三、“著书者之心术” / 322

第五节 史不拘例，因事命篇 / 327

一、六家二体 / 327

二、史不拘例，因事命篇 / 329

三、谨严灵活的书法义例 / 334

第十章 近代以来历史编纂学的若干问题 / 341

第一节 章节体的引入与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 341

一、章节体的引入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 341

二、章节体的引入与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 344

第二节 百年来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探索和实践 / 351